

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书系

中古时期蜀赣佛道文化交流 之个案研究

陈金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佛

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学研究书系

中古时期蜀赣佛道文化交流 之个案研究

陈金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古时期蜀赣佛道文化交流之个案研究/陈金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343 - 3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佛教史—研究—四川—中古
②道教史—研究—四川—中古 ③佛教史—研究—江西—中古
④道教史—研究—江西—中古 IV. ①B949. 2 ②B95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95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张 欣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2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宗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渗透力相当强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文化^①是区域（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区域性或地域性特征。宗教文化的研究，在相当意义上，就是探索区域宗教（地域宗教）的发展原因、过程、结果、影响、意义。然而，区域宗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局部的、封闭的、排他的，而是伴随着与其他区域宗教接触、冲撞、交融、并立、竞争、合流……区域宗教的发展总是与不同区域宗教之间的交流相联系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宗教交流，尤其是毗邻区域之间或地理交通联系紧密的区域之间的宗教交流，是中国宗教的显著现象。要真正地认识区域宗教交流，就必须深入地认识区域与区域之间宗教的异同及其相关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区域与区域之间宗教的比较研究。

—

当代美国文化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人类的生态与自然环境为文化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文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历史凝聚。”^② 无论何种社会文化形态都是历史现象，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时代条

① 为叙述方便，本书的宗教主要指佛教和道教，宗教文化主要指佛、道文化。特此说明。

② [美] 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高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件)和特定的空间(地理环境),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也是如此^①。地理环境是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尽管它不能创造宗教文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宗教文化创造发展的趋向,是宗教文化发生发展的前提和因素,也是宗教文化具备特色的基础。这是因为宗教总是以区域(地域)宗教的形式存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宗教特征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宗教在社会文化中地位独特而重要,一个地方选择哪种宗教和信仰这种宗教的程度,反映着这一地方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区域宗教研究揭示宗教在不同地域产生、发展、传播及兴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特色”。而这种所谓的“地方特色”,是与其他区域比较而显现出来的。

行政区域往往和自然地理区域密切结合,自然环境起着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的作用,行政区域则对区内的文化现象有着明显的整合作用。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强的渗透。国家与地方社会不但是彼此互动、相互联结的范畴,更没有绝对的分界,国家存在和国家行为本来就是地方社会及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地方社会也必然是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与中国疆域地理整体下的分区政治分不开。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区域宗教与全国宗教一直处于贯通与互动之中。区域宗教往往被国家宗教政治改造,纳入全国宗教的体系,全国宗教就是一个个区域宗教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区域宗教的研究,除了发现和抽象所谓的“地方特色”(“个性”),还应重视区域宗教的流动性与整体国家宗教的“共性”。只有把握“整体”的中国宗教与“局部”的区域宗教,抓住二者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宗教、区域宗教。宗教文化的区域性质是区域宗教文化研究赖以成立的基础。在一个中国的大背景下,要深入地研究区域宗教,除了要立足于区域宗教的发生、发展、传播、交流外,

^① 方广钊:《试论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还应关注它与其他区域宗教的联系、互动、异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作用和后果等，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区域宗教的特色、地位、影响、意义等。因此，区域宗教的比较是宗教研究的应有之义。区域宗教的比较是建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区域的地理人文基础上的，它们之间应该有宗教文化上的比较密切的联系，如果毫无联系或联系不多，就难以进行比较，即使能够比较也没有多大意义。同时，区域宗教比较必须把比较的区域宗教置于全国的时空范围之内，才可能有合适的比较标准，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地理因素是区域宗教比较的基础，当然必须考察地理环境与宗教的关系。研究者指出：“特定的区域，与其被视为历史过程的单位，不如理解为人们历史活动的空间，这种历史空间，一方面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和限制，同时也是人们自己的历史创造，是一种历史时间展开过程的表现。”^①但区域宗教的主体是宗教信仰者、实践者，包括那些高僧、高道、居士、文人、普通信众等，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他们的活动构成区域宗教的内容。因此，区域宗教比较研究应该以认识宗教信仰者的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他们与宗教环境的互动为中心；着重关注这些宗教信仰者在不同区域的思想内容与活动形式，以深入发掘区域与区域宗教之间思想文化产生异同的实质。

二

中国地域广阔无垠，地形地貌丰富多彩，经济、文化多元，形成了诸多的地理区域（单元）。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区域性（地域性）相当强，但在“统一”的背景下，区域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即使在分裂时期，区域间的宗教交流仍然会显得相当的活跃，形成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同处

^① 刘志伟：《引论：区域史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载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引论”，第6页。

于长江流域的四川（蜀）、江西（赣）是中国古代佛教、道教比较发达的地区，在中国佛、道发展历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两地的佛教、道教不仅各自兴盛发展、各显精彩，而且相互之间也展开了较为密切的交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竞争，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区域宗教文化，一定程度上形成蜀赣宗教的“一体化”，对两地乃至全国宗教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宗教史上颇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隋书·地理志》描绘的四川地形地貌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事实上，四川盆地是一个四周高峻、中间低陷的典型盆地。它东边有巫山；南边有大娄山、大凉山，而又紧邻云贵高原；西边有龙门山、邛崃山、峨眉山，再往西就是横断山；北边有米仓山和大巴山。这在地形上可以视为全封闭型的地区。这种地理特点决定了巴蜀先民与外界联系有极大的困难，其最突出表现，就是“蜀道难”。有关蜀道难的记载不少，但最集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四川盆地封闭型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地方特点，也出现了自我封闭的可能性。然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实际上并没有阻挡经济文化的交流，不过在交流中呈现出封闭的特色而已。蜀人有封闭保守意识，但也有强烈的突破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对外开拓的意识。他们通过崎岖的山道（水道）拓通与中原、西域、西南、华南乃至更广泛地区的联系。如蜀地南边接云贵高原，险阻相对较少，又有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安宁河相通，特别是安宁河谷，是一条很重要的自然通道。盆地东边虽有巫山阻隔，但有长江水运交通线。四川的绝大多数河流注入长江，构成了一个以长江为主干，辅以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为支干的水道网。虽然水路交通多风波、险阻，但通过长江水路联系荆楚、江南等地，仍是蜀民极其主动的行为。蜀地先民鱼凫氏就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迁徙到川西的，开明氏也是从荆楚迁川西的。历史上的巴蜀其实是四周文明的汇聚地，巴蜀文化的发展史，其主

要特征不是它的封闭性，恰恰相反，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是地理上的封闭和经济文化上的开放共存。

“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地形地貌多杂以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它“东通浙闽，南尽大庾，西连荆楚，北至大江”^①，“豫章水陆四通，山川特秀，南接五岭，北带九江，咽扼荆淮，翼蔽吴越”^②。在地理形势上位于南部中国的相对中心区域，扼中原通往浙、闽、粤等地中转的咽喉，是南方道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南朝刘宋雷次宗《豫章记》所称豫章“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初唐王勃《滕王阁序》所言“（洪州）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即是江西地理交通的形象写照。先秦时期，江西就因地理交通的相对便利而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区域有了经济文化的往来。自秦汉以来，江西已日渐成为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基本通道之一，在中国交通地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然而，江西基本上是以赣、抚、信、饶、修五大水系为中心，其间的山脉构成各大水系之间天然的分水岭，形成以流域区分、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时各大水系又以鄱阳湖为联系中枢，通过水道把不同的地貌单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江西全境不规则的环状组合的地貌格局。分布于江西境域周围的山脉，除了一些山隘关口外，呈现相对封闭的地理形势。江西境域本不广阔，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地理形势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形成独特的文化区域。

由上所述，四川与江西有相似的地方，同处于长江流域，属于中国南方，可地理环境自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经济文化也颇具开放性。然而，两地也有相当大的差别，诸如：四川地域比江西广阔得多，地理环境也比江西复杂得多；江西处于中国相对中心的位置，而四川则偏于西南一隅；江西的道路交通要比四川发达、方便得多。从地缘来说，四川与江西并不相连，空间上无论从哪条路线都隔有一个以上的省区。不过，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文化的作用，巴蜀与中原、江南联系在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三《江西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②（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四《江西二》。

一起，也把江西联系在一起。在古代交通路线中，水路交通极其重要，四川与江西因长江水系的作用，应该说是比较便利的；陆路交通虽辗转曲折，两地也有多条路线方便往来，由此两地形成了交流较为密切之区域。

“地理环境只能是一种必要的或有限的条件……自然毕竟只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应该由人类来决定。他们是否打算，并以什么方式来利用它。”^① 四川和江西虽均属于长江文化区，但具体而言，一是巴蜀文化区，二是由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融合赣地文化而形成的赣鄱文化区，两者之间相似的地方不少，但差异仍然巨大。因而，两地的文化异同特点都相当显著，有进行比较的价值与意义。众所周知，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人员流动的广泛、活跃、频繁，是区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推动力。历史上任何宗教活动或宗教现象，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是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理联系的基础上，无论是道教的天师道、净明道、全真道，还是佛教及其相关的禅宗，两地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拉起这一联系纽带的，主要是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满怀宗教热忱与情怀积极地往来于两地，如张陵到鹤鸣山创道、张盛至龙虎山兴教；如许逊在蜀赣两地宣扬道家“忠孝之道”；如马祖道一从蜀地辗转至赣地创立洪州宗；如圆悟克勤于蜀赣两地发展兴盛临济杨岐宗。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以自己的文人情怀，在两地之间书写着宗教信仰的传奇，如蜀地的李白、“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张商英……就曾在江西地区问道访佛。当然，还有更多的普通信众，有意无意之中担当了蜀赣两地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些普通人物，尽管在宗教史上默默无闻，但也是两地宗教比较研究中应予关注的对象。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尽管人们普遍信奉“安土重迁”，但人口区域间的流动和迁徙仍是一种常态。人口流动深受道路交通路线的影响，宗教文化的交流显然也不例外，甚至显得更为活跃，更有力度。受宗教情

^① [美] 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怀所激励的宗教人士，冲破自然、社会的种种阻碍纵横东西驰走南北的“走江湖”式的情形可谓十分流行。蜀赣两大宗教文化区域之间的交流，是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的联系。两地的宗教交流也并不意味着四川只与江西，江西只与四川交流，他们各自都有更广的交流对象。例如，江西是长江中游的核心区域之一，承担了上游与下游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与交流中转地的任务，也承担了南北方宗教文化联系与交流的责任。因此，蜀、赣两地的宗教文化活动，实际上在更大范围内把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宗教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两地的宗教文化既有本土创造的，更有两区域之外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域，受自然地理形势的影响至深，也深刻地影响到区域宗教文化。因此，区域宗教也显现出不同区域的特点。四川、江西的天师道、全真道、佛教禅宗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虽然它们的“地方性”具有整体的普遍性，但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变异，使宗教文化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之上，因此，宗教出现“蜀化”和“赣化”的现象。

受地理人文因素、社会环境、宗教人物活动、民众信仰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与作用，历史时期，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四川地区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的两个重要地区已经形成，宗教文化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两个地域的宗教文化联系紧密，宗教互动有着典型的代表性，具有比较研究的基础与意义。

三

一直以来，中国内部的区域宗教比较研究是宗教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研究者历来注重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交流与比较，也注意到了中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的宗教异同。但是，对于两个具体地区（区域）之间的宗教比较，或由于研究者的旨趣和思维，或受制于研究资料，迄今尚未真正展开。前辈时贤对江西与四川两地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可谓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但把两地宗教联系起来的论著则

难觅见，尽管江西、四川的宗教有比较的必要也可以进行比较。因此，给笔者写作本书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的同时，却也存在诸多的困难——缺乏相关的学术参照。同时，古代江西与四川两地的佛教、道教资料丰富，前辈时贤研究论著众多，却少见有系统的文献资料，因而仅相关的资料查找与整理就困难重重。而选择两个省区进行区域宗教比较也只是一种研究模式的探索，没有样本可参考，对研究思路与方法又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本书力图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在研究思想与方法上有所创新、超越，比较研究历史时期的蜀赣两地宗教，除了研究各自区域发展的状况、在中国宗教史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外，还必须了解蜀、赣宗教文化与其他区域的交流。本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把握古代江西、四川两地宗教各自的“特色”，认识两地宗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之中发生变异情形；二、比较全面地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对两地宗教的影响，分析两地宗教异同产生的深层原因；三、两地宗教异同与全国宗教之间的关系，了解其他区域宗教对两地宗教的影响与作用，以及两地宗教的差异对全国宗教的影响。

限于笔者的学力，本书选择五个专题进行个案研究，这七个专题分别讨论：天师道与地域转移的关系、蜀地天师道向龙虎天师道转移的过程及其原因；全真道在宋元明清时期蜀赣两地发展传播的同异及其产生同异的原因，兼及两地全真道之间的交流情形；通过李冰与许逊两个“治水”人物的“神迹”演变，说明道教造神的深层原因与蜀赣地域文化的关系；通过文昌帝君信仰与净明道文化的关系，亦在于从较深层面上认识蜀赣两地道教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影响；通过净众、保唐宗与洪州宗的比较，认识禅宗在不同的地域的发展历程，以马祖道一洪州宗与蜀地禅学、圆悟克勤与蜀赣禅宗文化的关系，探讨蜀赣两地禅宗的发展与宗教者的关系及蜀地禅宗与赣地禅宗异同的深层原因。由此着重揭示：地域人文因素、宗教情势、国家的宗教政治、宗教人士的活动等因素互相作用下的蜀赣宗教发展实质；区域宗教在中国宗教的大背景下，走向地方化的历史过程。

本书之所以不避有泛泛之论的嫌疑，选择历史时期（从东汉中期至

晚清)的四川与江西地区的佛教、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东汉中期是佛教、道教开始影响中国文化的历史时期,也是四川、江西两地佛教、道教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几乎与此同时,两地的佛教、道教即开始了交流的进程。选择东汉作为论题的开始,无疑有其实际意义。而延伸至晚清,则将研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利于整体把握宗教发展与流变,准确地认识两地宗教的异同。因为宗教文化交流后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看得出来。譬如,唐代蜀地禅宗在江西的影响,江西禅宗最终反过来影响蜀地禅宗,直至两宋才有比较明确的反映。

宗教的产生、发展、演变、兴衰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本书将蜀赣两地宗教置于中国宗教的大背景下,突破区域的界限,从而表现其在一个时代和四川、江西特有的空间中所独具的宗教信仰形态与人文精神,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四川、江西两地乃至全国的宗教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无疑可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认识蜀赣两地宗教的“蜀化”与“赣化”现象及其实质,并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中国宗教。本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东汉至清代)江西、四川两地宗教的历史渊源关系,两地宗教的交流与互动,两地宗教在交流中的流变等问题,力图把握两地宗教相互作用影响之下发展的轨迹,以此揭示历史上中国传统宗教发展的若干规律。

本书是在古代中国范围内首次对两个具体区域的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私下认为对当今宗教文化研究视野的开拓、研究思想与方法都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它的完成,或许将直接拓展古代四川、江西两地宗教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区域宗教的比较研究。当然,由于笔者初涉宗教学研究领域而学力有限,本书的研究内容相当庞杂,跨越的时空广阔,研究方式又比较特别,必然存在诸多的不足与问题。祈请方家教正。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从鹤鸣山到龙虎山

——空间地域转移与天师道的演进	1
-----------------------	---

一 张陵鹤鸣山创立天师道的文化意旨	1
二 张修、张鲁与“五斗米道”的兴盛	14
三 魏晋军政情势与蜀地天师道的顿挫	23
四 门阀政治与两晋天师道信仰的异化	30
五 张盛龙虎山复教及其意义	37
六 寇谦之、陆修静道教改革对天师道的影响	44
七 唐代重“老子”与龙虎山天师道的崛起	60
八 宋元道教政治与龙虎山天师道地位的确立	69
九 地域·政治·天师与天师道发展道路的抉择	75

第二章 宋元明清蜀赣全真道发展路径之比较

81

一 唐五代蜀赣内丹思想与南宗的形成	81
二 蜀赣南宗与元代全真道南北合流	95
三 明代蜀赣地全真道的曲折发展与传播	102
四 清代蜀赣全真道的兴盛与衰微	108
五 地域文化与蜀赣全真道发展的关系	118

第三章 蜀赣道教“造神”之比较

——以李冰、许逊为中心	127
一 李冰治水事迹及其神化	127
二 许逊诛除“蛟害”与治水神迹	133
三 李冰与许逊治水神迹的趋同	141
四 赵昱、二郎与李冰治水“功绩”的弱化	146
五 蜀赣道教造神与李冰、许逊的命运	161

第四章 文昌帝君信仰与净明道文化

一 文昌帝君信仰是蜀地道教造神的产物	169
二 文昌帝君信仰构建与净明道忠孝文化	178
三 文昌帝君信仰对净明道文化的弘扬	186
四 文昌帝君信仰与净明道结合的文化意义	191

第五章 净众—保唐宗与洪州宗异同论

一 净众—保唐宗与洪州宗禅派发展的异同	193
二 净众—保唐宗与洪州宗禅法思想的异同	204
三 净众—保唐宗与洪州宗异同产生的原因	223

第六章 马祖洪州宗与蜀地禅学

一 马祖洪州禅法与蜀地禅学渊源	232
二 马祖返蜀弘法事实的推证	235
三 无住禅法与马祖蜀地弘法失败	238
四 马祖洪州宗与蜀地禅学关系疏远析论	243

第七章 圆悟克勤与蜀赣禅宗文化交流

一 圆悟克勤巴蜀学法深受江西禅宗的影响	251
二 圆悟克勤首次出川主要学习江西禅法	255
三 圆悟克勤开法江西云居山的禅宗功业	260

四 圆悟克勤与江西禅宗关系所见蜀赣禅学交流	269
结语	272
主要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88

第一章 从鹤鸣山到龙虎山

——空间地域转移与天师道的演进

东汉中期^①，张陵（张道陵）于蜀地鹤鸣山（一名“鹄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道教教派——天师道（五斗米道）。其后，天师道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或瓦解、或分化、或整合、或沉沦、或复兴的曲折发展，至元代终于确立了以赣地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天师道派。天师道活动的中心从鹤鸣山转移到龙虎山，是蜀、赣地理人文因素与道教演进以及国家宗教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其发展与传播模式不断探索、抉择后的重大变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蜀、赣两地乃至全国道教的发展趋势与宗教性格，无疑值得特别关注。

一 张陵鹤鸣山创立天师道的文化意旨

据有关张陵的文献资料记载，张陵（34—156），又称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为西汉留侯张良八世孙。张陵少即研读《老子》以及天文、地理、河洛图讖之书，接受了道家的思想。又曾入太学，博通五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东汉明帝时（58—75）曾为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显然也富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实践。因感生命短促，方仙道意识潜滋暗长，遂隐退北邙山

^① 笔者注意到，一直以来，学术界在叙述张陵创立道教（五斗米道、天师道）的时期，绝大多数言称是“东汉末年”或“东汉晚期”，事实上，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东汉鼎建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覆亡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张陵创立道教的时间为汉顺帝汉安二年（143），此期尚处于东汉中期。

(今河南洛阳北), 潜心长生久视之道, 修炼三载。建初五年(80), 汉章帝征召不起。永元初(89), 汉和帝征为太傅冀县侯, 三诏不就, 而四出游历以求创教之地。先游淮地, 居桐柏太平山, 又独与弟子王长从淮入鄱阳, 登江西乐平雩子峰。又溯流入江西贵溪云锦山炼九天神丹, 丹成而龙虎现, 即将云锦山改名为龙虎山, 以之作为修身养性的基地。其后又转至蜀地修道创教。关于张陵于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在蜀地鹤鸣山创立天师道教, 史籍多有记载。例如,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说:“(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 学道鹤鸣山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略详:“汉末, 沛国张陵学道于鹤鸣山, 造作道书, 自称‘太清玄元’, 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 故谓之米贼。”东晋葛洪《神仙传》卷五《张道陵》增饰为:“张陵学道后, 闻蜀人多纯厚, 易可教化, 且多名山, 乃与弟子入蜀, 住鹤鸣山, 著作道书二十四篇……能治病, 于是百姓翕然事之以为师, 弟子户至数万。”《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及张陵受道于鹤鸣, 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 弟子相授, 其事大行。斋祠跪拜, 各有成法。……其书多有禁秘, 非其徒也, 不得辄观。”

秦汉时期, 江淮地域巫风浓郁, 神仙方术流行, 对于修道创教来说, 自有不少有利的因素。然而, 江淮地域人文素质相对较高, 创教竞争又相当激烈(太平道即以此作为主要区域之一), 作为道教理论素养尚不充足、个人宗教影响不高的张陵来说, 在此地域创教难度极大。另外, 江淮地域自先秦以来一直是统治者较为关注的地区, 在国家政权尚处于稳定的东汉中期, 创教的政治压力也相当大。张陵长期活动于江淮, 又曾进入统治机构(尽管是中下层), 自然深知在当地难以有效地展开教务活动。相形之下, 巴蜀地区更适合创教弘道。巴蜀自先秦以来古巫术流行, 巫鬼风气弥漫。早在商代三星堆古蜀文明时代, 以萨满为特征的巫术就已笼罩在巴蜀大地上。东汉时期, 巴蜀地区因地处僻远, 交通不便, 是夷、羌、氐等少数民族的聚居之所, 其人文素质自然落后于中原。又由于当地疾疫比较流行, 医疗水平低下, 民间以为系鬼魅所致, 巫鬼之风盛而不衰。《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民失在微巫, 好鬼妖。”《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说这里人“俗好巫鬼禁忌”。